

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

陳 建 華^{*} 著

張 暉^{**} 譯

摘 要

在二十世紀中國流行的關鍵詞中，最具影響的大約非「革命」莫屬。由此詞所構成的政治意識形態，其最初形成須追溯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通過漢語「革命」、英語“revolution”和日語「かくめい」之間翻譯、傳播、衝突和融合的複雜過程。古代儒家經典中「湯武革命」的話語在後來頻繁發生的政變和改朝換代的歷史中，成為新皇朝建立的合法根據，但其叛亂與暴力的性質構成儒家倫理的內在矛盾。因此「革命」既是禁忌也是圖騰。十九世紀以來世界革命風起雲湧，在中國要求改革的聲浪中，「革命」被召喚到歷史前臺。本文以王韜、孫中山與梁啟超為例，具體分析他們在跨語言、跨文化語境中使用「革命」的不同情況。在英語、日語的翻譯和流通中，「革命」意義變得寬廣而複雜微妙起來，既指政治上的劇烈變革，也指社會各行各業及日常生活的變化。一方面由於進步史觀的加盟，政治暴力被合法化，另一方面給人們帶來美好未來的許諾，遂使「革命」意識形態站穩了腳跟。

關鍵字：革命、revolution、かくめい、王韜、孫中山、梁啟超

* 作者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 譯者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Syntax of World Revolution

Written by Chen Jian-hua

Translated by Zhang Hui

Abstract

Among the keywords used and circulated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geming* was perhaps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 With *geming* at its core revolutionary ideology was forme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rough complicated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gem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and the Japanese *kakumei*. Rooted in ancient Confucian texts, the meaning of *geming* was originally related to the military overthrow of previous regimes by the emperors Tang and Wu, while in later periods it was increasingly employed to legitimize newly established dynasties. Yet as dynastic overthrows often went hand in hand with violent upheavals and were thus at odds with Confucian ethics, *geming*, too, took on a pejorative connotation, becoming both totem and taboo.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 international rhetoric of world revolution, *geming* reemerged in the context of anti-Manchu sentiments. Focusing on Wang Tao, Sun Yat-sen and Liang Qi-chao,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ir respective

uses of *geming* in translingual and transnational contexts. It is shown that through numerous acts of translation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term was rhetorically and ideologically broadened: On the one hand, *geming* legitimized anti-Manchu revolution in the name of a progressive narrative of history,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called for a change of the whole of society, carrying with it promises of a bright future. As a consequence, the ideology of revolution gained a foothold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geming*, revolution, *kakumei*, Wang Tao, Sun Yat-sen,
Liang Qi-chao

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

陳 建 華 著

張 暉 譯

一、前言

在二十世紀，「革命」這一古漢語的複合詞，通過日語かくめいの轉譯，被復活和重構，並被納入姿彩繽紛的「世界革命」的意義脈絡之中。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改革者和革命者無不將「革命」和英語“revolution”一詞同義或轉換，並就其所理解的「革命」語義及其有效性進行了長期的爭論。在清朝末年，從溫和的社會改革的提議到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吶喊，各種社會運動無不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由此引發了歷史意義和行動的激烈而反覆的交鋒。

1902年，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代言人的梁啟超（1873-1929）看到全國上下日益高漲的革命熱潮時，憂心忡忡地寫道：「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¹事實上對於「革命」這一新概念的流行，梁啟超難辭其責。中國歷史

* 原文“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Syntax of World Revolution”，刊於 Lydia H. Liu（劉禾）編：《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頁355-374。此文由張暉譯出，在此致謝。這次發表對原文作了少數必要的修改與補充。

¹ 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新民叢報》第17號，1902年10月，頁1-7。

上所謂「湯武革命」一向指謂由暴力手段達成的改朝換代，當梁啟超發覺日人用「革命」來翻譯源自歐洲的“revolution”一詞，而泛指世間一切事物的變化，於是他也熱烈鼓吹這一「革命」新義。這個被更新的古漢語彙在渴求進步的散文家和政治活動家的各類文章和演講中被頻頻使用。和梁啟超一樣，在世紀之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流亡或留學到日本。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革命」一詞得到異常迅速的傳播，遂構成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所說的中國「革命之謎」（the mystique of revolution），即「激進主義在20世紀最初十年站住了腳跟。」²

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灼見地指出，古漢語中的「革命」一詞與二十世紀中國人所使用的「革命」已不再是同一個詞，而是「一個重新回到漢語中的翻譯詞彙，就好像現代日語中的かくめい一詞是借用漢字符號『革命』來比喻性地表達 revolution 的意義一樣。」³然而，富蘭克（Wolfgang Franke，1912-2007）認為，「革命」一詞所表達的內容「結合了傳統的概念與近代西方思想以及西方的 revolution 概念。」⁴他們的見解儘管有所不同，各自突顯「革命」、「かくめい」和“revolution”三個詞語的跨文化翻譯的不同層面，並涉及更為普遍的如何討論變化、語言和意義的問題。在新近的研究中，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發現，在陶成章（1878-1912）1908年的文本中存在兩種不同意義的「革命」的「語義衝突」（semantic conflation），其

² Benjamin Schwartz, “Introduction,” in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3.

³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Vol. 2, 119. 關於現代中國革命和它的文化起源的關聯，日本學者的研究甚有價值。參見小島佑馬：《中國の革命思想》（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竹內好、野村浩一編：《中國 I：革命と傳統》（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

⁴ Wolfgang Franke,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70), 1.

中的一個意義來自儒家經典《易經》中的「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另一意義則指社會結構的改變，源自現代“revolution”意義上的日語新詞。⁵他所說的「語義衝突」與我的研究關係密切，但問題懸而未決：即「革命」作為一個新詞在何時、如何從日語中返回漢語的？

在《跨語言實踐》一書中，劉禾把「外來新語」(loanword, neologism) 作為理論問題提了出來，並且作了深入的探索。在討論近代中國歷史上外來語和新辭彙的輸入以及它們對理解現代思想的影響時，她認為現有的哲學研究取向和分析範疇不足以解釋諸如「國民性」、「個人主義」和「文化」等概念如何在不同語言的翻譯和傳播過程產生新的意義的。她提出「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 的概念，在跨文化的更寬廣的語境裡探討了翻譯的意義。⁶

本著同樣的精神，本文將從跨語言和跨文化的角度分析自世紀之交至1904年間「革命」、「かくめい」和“revolution”三詞之間的翻譯和傳播過程，從而追溯中國「革命」話語的現代起源。當然，革命不必始自於「革命」這個詞的使用，而對革命的研究也不必始自於對它的使用的追溯。但在以前關於中國革命的研究中，「革命」基本上被當作一種比喻來使用，正如勃林頓(Crane Brinton, 1898-1968)寫道：「它幾乎是變化的同義詞，可能意指突然或重大的變化。」⁷所謂「中國革命」即指一個現代現象——是對世界革命的回應或屬於其中的一部分，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所指出的，十八世紀之後西方的革命具有現代特徵。⁸費正清(John Fairbank, 1907-1991)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描寫到，中國革命是在「現

⁵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26.

⁶ Lydia H. Liu (劉禾),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

⁷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3.

⁸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65), 21-52.

代科學技術」的「國際影響」之下的一系列變革的過程，儘管它是一個未完成的現代化工程。⁹

然而，探究古漢語「革命」一詞經過中、日文轉譯全球革命而在現代的復活和改造的過程，或能得到不同的結論。¹⁰ 以下我將分析王韜（1828-1897）、孫逸仙（1866-1925）和梁啟超的文本，而重點將集中在他們對「革命」的翻譯和重估的話語實踐上。話語實踐遠遠超乎字面翻譯中句法和文脈的限制，也超乎「信」與「達」的理論爭辯。這三位知識分子對「革命」概念的表述通過三種不同的著述類型：歷史學、政治學和文學。他們的知識背景、政治動機和社會關係決定了他們關於此觀念的詮釋。而且三人都立志於將他們革命行為和民族認同普世化。但與此同時，他們的「革命」內涵不同程度地與儒家文化發生瓜葛，意味著朝代更替、天命、國家主權以及忠貞的倫理道德，因此使得他們的表述變得更為複雜。直到1903年鄒容（1885-1905）的《革命軍》出版，「革命」的譯意才趨向穩定。「革

⁹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A Cornelia & Michael Bessie Book, 1987), 7-8.

¹⁰ 追查「革命」在近代的使用既有助於我們解決一些文獻上的問題，也有利於以更適當的方式使用歷史資料。例如，梁啟超在1920年代回憶他早年的「革命」理念和行為，但事實上他在戊戌變法失敗流亡至日本之後才正式使用「革命」一詞。如金觀濤注意到最早在1899年6月梁氏〈論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出現「宗教革命」一詞。參見金觀濤：〈革命觀念在中國的起源與演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13期（2005年6月），頁12-13。然而更產生影響的是在1899年底他提出的「詩界革命」一詞。我在〈晚清「詩界革命」發生時間及其提倡者考辯〉中指出，大陸的文學史家被梁啟超的描述所誤導，一向宣稱「詩界革命」開始於1897年。這種錯誤乃由於昧於當時「革命」的翻譯歷史語境所致。參見陳建華：〈晚清「詩界革命」發生時間及其提倡者考辯〉，《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321-340。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興中會章程〉的最初版本中，並沒有「革命」這個詞，然而它後來被史學家更名為《興中會革命宣言》。民國史學家馮自由特意在一篇論文中糾正這個錯誤。參見陳建華：〈晚清「詩界革命」與批評的文化焦慮——梁啟超、胡適與「革命」的兩種意義〉，收於 John C. Y. Wang (王靖宇) e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1-245.

命」話語在他們的實踐中反映出跨語際狀況所具有的偶然性、隨機性和可塑性，且是一個開放的闡釋空間。

二、前現代中國和日本的革命話語

勃林頓說：「革命是意義不明確的詞語之一。」¹¹ 在我討論「革命」和「かくめい」時，情況也是如此。每一個詞語都有其歷史，並且它的意義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在給「革命」下定義之前，我首先要對梁啟超在1904年給革命所下的定義加以考慮，這會提供一個意味深長的歷史語境，有助於本文的討論。在〈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梁啟超對「革命」的廣狹二義作出了區別。廣義的革命包括社會、政治結構上的改變，以和平或者暴力的方式得之。而狹義的革命專指武力行動，尤其指推翻中央政府。據梁啟超稱，前者從西方的革命經驗中誕生，將人類歷史帶入現代；而後者指中國過去造反式的巨變。他對歷史上農民反抗中暴力、自私和落後性質的描述反映了他對當時排滿運動的不滿。這主要歸因於梁啟超本人不斷變化的政治觀以及他對清政權愛恨交加的情緒。然而，他對革命的定義影響了數代知識分子。¹²

在闡述梁啟超的政治觀點之前，需要簡要地討論一下「革命」一詞在儒家經典《易經》中的原始根據。¹³《易經》這樣描述「革命」：「天

¹¹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3.

¹² 參見梁啟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叢報》第46-48號（1904年2月）。秦力山在1905年寫過一篇長文〈說革命〉，文中他同樣把革命區分為廣義和狹義，但是和梁啟超的區分有些不同。參見秦力山：《秦力山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14-171。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張朋園：〈革命與現代化交織下的近代中國〉，《思與言》第29期（1991年9月），頁2-19。1905年，在改革者和革命者之間，也發生了一系列關於革命理論的爭辯。這導致「革命」的兩種意義更加混雜。參見朱泮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¹³ 在古漢語中有兩個影響較小的具有「革命」內涵的主題。一個是堯舜禪

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¹⁴這一經典表述的核心是對皇朝更迭的肯定，湯武革命在三個方面被合法化：它們在宇宙哲學層面「順乎天」、在社會層面「應乎人」，在自然層面好比四季變化具有內在運動的必然性。然而，這篇權威文獻卻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君主的頭上，因為叛逆者或敵人能以天道人心的名義宣稱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到了二世紀中期漢景帝時，朝廷上圍繞著經典文獻中「革命」概念的正當性問題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當一個書生開始質疑漢皇朝的建立時，景帝劉啟制止了這場爭論。¹⁵這個問題暴露了《易經》中隱含的權力和道德正義之間的矛盾：根據儒家的倫理原則，湯武革命首先以不忠為前提，絕不可能合法。問題也出在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那裡，他靠武力反叛而最終推翻了秦朝。

大多數儒家學者在「革命」的問題上保持沉默，如果不可避免的話，也必然深懷敬懼。雖然如此，這場爭論在十二世紀的新儒家那裡得到延續，但焦點聚集於孟子的革命理論。孟子宣稱湯、武推翻舊朝代表了正義，因為他們履行了儒家最高的道德準則——「仁」，同時也體現了人民的利益。新儒家的興起，掀起了重新注解和闡釋儒家經典的新浪潮，以回應南宋（1127-1279）的政治和文化的危機。1190年，當時新儒家領袖之一朱熹（1130-1200）出版了《四書章句

讓的傳說。結合這個故事，「革命」意味著朝代的和平更替。例如〈馮衍傳〉，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354。1901年，當改良派對革命思想的傳播憂心忡忡時，他們用上述的思想去闡述「革命」，試圖抑制排滿思潮。參見樹立山人：〈尊革命〉，《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94冊，1901年10月，頁5973-5975。但這篇文章幾乎沒有起到什麼影響。另一「革命」理論與古代干支紀時系統有關。在漢代（206 B.C.- 220 A.D.），這個系統經常被朝廷用來預測政治事件，而漢代之後，這種「革命」理論被儒家所排斥。十九世紀晚期，吉田松陰在這個天文學的意義上使用過「革命」。參見本文中關於「革命」日譯的部分。

¹⁴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02-203。

¹⁵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122-3123。

集注》。該書包括《論語》、《孟子》等儒家基本典籍，並匯集了新儒家的注疏。在後世它被採用為官方讀本，對中國的社會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對孟子革命話語的諸多注釋中，新儒家對革命的態度似乎同他們的先輩一樣充滿弔詭。總的說來，不同於漢儒講究宇宙哲學，他們更關心現實實際，將重點更多地放在「人情」而非「天命」之上。如張載（1020-1077）說：「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¹⁶ 他的闡述傾向於以征伐的結果，而非仁愛的原則來判斷天命。所謂「人情」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因為似乎只有當權者才可以決定「革命」與否。而另外一些學者更為肯定地強調「民心」。趙歧說：「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朱熹回應說：「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¹⁷ 趙和朱都更明顯地表達出民本的意向。

日語「かくめい」是「革命」的譯文，在日本本土文化中沒有相對應的詞。¹⁸ 根據最近的研究，早在八世紀，孟子的革命理論就開始在日本旅行。¹⁹ 然而，在這個文化上深受中土影響而又保持其自身特性的國度裡，「革命」一詞開始了新的旅程。正如溝口雄三先生所說，基本的差異在於中日兩國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傳統：前者根植於易

¹⁶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22。

¹⁷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222、221。趙歧的話為朱熹所引用。

¹⁸ 「革命」本屬漢字。在日本有兩種方式閱讀漢字。一種是訓讀，用日語的音讀漢字；另一種是音讀，讀漢字音。「公」字在日本既有音讀“ko”，也有訓讀“oyake”。“oyake”是日本原有，其意義與漢字「公」有很大差異。至於「革命」在日語中沒有音讀。1993年2月，筆者參加了溝口雄三教授關於中國思想中「私」和「公」的討論班，當時他正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訪問。在解釋「公」時，他指出公共空間在日本和中國的不同。這個例子可以有助於理解「革命」這個個案。

¹⁹ 根據最近的研究，《孟子》一書早在八世紀已經傳到日本。參見野口武彥：《王道と革命の間》（東京：築摩書房，1986年），頁5。

姓革命的思想傳統，後者則是依存於萬世一系的天皇觀。²⁰ 中國「革命」理論經歷了新的旅程，逐漸被改造並與日本政治相協調。

發生在日本中世時期的一次政治事件極大地影響了「革命」的意義。西元900年，朝廷的文學侍臣三善清行（847-918）上書與國家的第二號權貴菅原道真（845-903），預言翌年為「辛酉」年，將會發生大事。利用曆法的神秘性，三善清行上書力勸菅原道真從他仕宦生涯的頂峰急流勇退，以避免政治上的失勢。三善清行「辛酉革命之年」的理論來自於中國的典籍《易經》，但它在中國本土早已失傳。事實上菅原道真倚仗皇帝的寵倖而迅速崛起，因而遭致忌恨；推翻菅原的謀畫已在暗中進行，三善也參與其間。²¹ 但菅原拒絕引退。次年，朝廷利用三善的預言，罷黜了道真。由此，「革命」這個詞在日本產生了新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它脫離了原先旨在使新政權合法化的漢語語境，而被用來加強現存皇朝的主權，開了一個和平政治變革的先例。這說明漢語「革命」理論的應用是由日本政治體系的特質所決定的。

在江戶時代（1603-1868），日本的革命理論發展出比較清晰的民族主義特徵。如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指出，「德川時代的國學者認為儒教不適合我國的國體，因此痛斥異姓革命的理論」。²² 在德川家族的統治下，新儒學研究甚活躍，它帶來了在中國所沒有的經驗：「首先，它將重心放在皇權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和連續不斷的天皇制度方面，這最終燃起人們對君主的新的忠誠，而為皇政復辟鋪平了道路；其次，它激發起新一輪對本土宗教傳統的熱情，並促成日本神

²⁰ 溝口雄三：〈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色〉，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343-361。

²¹ 所功：《三善清行》（東京：吉川弘文館，1970年），頁71-100。另參見G. B. Sansom,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2), 208-209.

²²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年），卷12，頁12747。

道的復興。」²³ 隨著民族和宗教意識的覺醒，江戶時代的思想家們爲了自己的目標而改造了新儒家。毫不奇怪，此時中國的「革命」理論，尤其是孟子的革命理念，成爲他們批評的目標。例如，神道的重要宣導者山崎闇齋（1618-1682）曾經寫下〈湯武革命論〉一文，反對孟子的「放伐」說，強調對日本天皇的忠誠。他的弟子淺見綱齋（1652-1711 或 1712）則乾脆把湯、武說成是「弑主之大罪人」。²⁴

儘管他們批評中國的革命理論，但日本既沒有摒棄儒學，也沒有排斥「革命」。至德川末期，激進的愛國志士提倡「尊王攘夷」運動，革命話語被重新鑄造，一方面反對幕府專權，另一方面主張在天皇的領導下進行封建制度的改革。「革命」轉化爲政治改革的動力。賦予「革命」一詞以現代意義的關鍵人物是吉田松陰（1830-1859）。他的思想結合了民族主義、儒家道德倫理和學習西方的熱忱，被視作改革運動的偉大英雄。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吉田將「革命」同古代曆法中的神秘涵義相聯繫，並追溯其源頭起始爲日本開國的神武天皇所創的「辛酉革命」的傳統。²⁵ 吉田雖然深受孟子的道德理想的影響，但他徹底摒棄了與他尊君理論相矛盾的「放伐」革命說。

三、王韜和孫逸仙：從造反到革命

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很可能始自 1848 年徐繼畲的《瀛寰志略》，在中國大量出版了介紹外國歷史地理的書籍。這些書籍或由西洋傳教士編纂，或出自中國士大夫之手，教會中國人去認識世界是一個圓

²³ Ryusaku Tsunoda (角田柳作),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ed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208-209.

²⁴ 參見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02。

²⁵ 奈良本辰也、眞田幸隆編：《吉田松陰》（東京：角川書店，1976年），頁254-255。

球，而中國只不過是萬國中的一國。1890年面世的王韜《重訂法國志略》是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書中將“French Revolution”一詞譯作「法國革命」，並首次將其引入中國。該書主要根據一些日譯本的有關法國和世界歷史的書籍匯編而成，其中關於法國革命的章節在很大程度上因襲了1879年在日本出版的岡本監輔（1839-1904）《萬國史記》一書。

根據《萬國史記》一書的綱要所說，岡本參考了大量由日本學者翻譯的西方歷史書籍。受到明治時代熱衷西學的影響，他編寫此書目的是為一般學校提供世界史教材。書中對法國革命表達了模稜兩可的態度，反映了明治時代的政治輿論。²⁶當“French Revolution”譯為「法國革命」時，它作為人類歷史上偉大事件而被承認。與此同時，它的陰暗面——大規模的叛亂、暴力、社會混亂以及迫害君主——遭到嚴厲的譴責。岡本的處理很值得注意：在敘述巴黎民眾傾覆皇朝的過程時，絕對不使用「法國革命」或「革命」，而代之以「亂」。直至述及波旁王朝復辟的章節裡，「革命」才出現：

一千八百十四年，五月四日。拿破崙至厄爾襪島。是日，路易第十八入巴黎斯，登王位，欲與聯合諸國結好。五月，及俄、奧、普、英諸國人，會於巴黎斯行成，定法國界，比革命前差廣。²⁷

在同一章稍後：

一千八百十五年，十一月。聯合諸國與法人會于巴黎斯講和。復王路易第十八位。……法國革命以來，全歐戰亂二十餘年，

²⁶ 明治時代對法國革命的觀點，在水谷由章譯述：《國會之瑾瑕》（東京：古文社，1892年）一書中有典型的反映。作者義憤地譴責法國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在大革命中對處死路易十六所作的決定，但同時認為這只是國民議會的錯誤，並非否定國民議會和自由以及民主政治的原則。

²⁷ 岡本監輔：《萬國史記》，1878年原刊於日本，本文據1900年華國堂藏本，卷11，頁6b。

至是炮聲始息，庶民得自太平。²⁸

王韜在《重訂法國志略》中基本保留了這兩段文字。²⁹這主要因為他熱切地希望通過日本的資源來傳播法國革命的普世話語。作為一個沿海地區的具有自由精神的改革者，王韜和當時其他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相信日人對西學的解釋是更加先進的。當他在1879年訪問日本時，晤見了岡本監輔，並稱讚他的新著《萬國史記》是一部「必傳之巨制」。³⁰

王韜因襲了岡本監輔對法國革命模稜兩可的觀點。依據中國歷史的編纂模式，他在評論中描述暴民及他們的領袖羅伯斯比爾和丹東為狂熱、殘暴的「亂民」和「亂黨」。對於路易十六的被殺，他哀嘆：「不幾天地反復，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紀綱紊亂乎？」³¹反過來，王韜認為對於飽受虐政之苦、揭竿而起的百姓來說，路易被處死也是罪由自取。

「法國革命」在中文裡含義曖昧，混淆了“revolution”和“rebellion”（叛亂）之間的界線，並賦予後者以某種合法性，從而給傳統的「革命」話語增添了新的意義。當時清皇朝日薄西山，社會經受空前的動盪，這種合法性的含義給政治帶來新的挑戰。從1850年代早期起，王韜在上海的西文報館裡作中文編輯。但是在1862年，他因為秘密溝通太平軍的罪名被放逐到香港。³²1860年代後期，他到

²⁸ 岡本監輔：《萬國史記》，頁9a。

²⁹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上海：淞滬廬刊本，1890年），第6卷，頁27a、第7卷，頁1a-b。柯文（Paul A. Cohen, 1934-）充分地討論過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和岡千仞《法蘭西志》之間緊密的關係，但他忽略了其所述的法國革命部分尤其受到岡本監輔《萬國史記》的影響。參見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1-127.

³⁰ 王韜：《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48。

³¹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第5卷，頁30b。

³² 對於王韜的「叛國者」身分，柯文作過詳盡的討論。他說：「在太平天國失敗之後，他對於現存主流思想的反叛更得到長足的發展，且成為影響深

法國遊歷，那裡的自由風氣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對法國以及巴黎的生活擊節歎賞。大革命之後法國的巨大變化激起了王韜對中國自由、民主社會的政治想像。他將世界政體分為三類：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和君民共主之國。法國屬於民主之國。王韜舉出法國革命如何導致拿破崙（1769-1821）在歐洲的霸權以及波旁王朝如何失去民眾支持而垮臺的例子，來強調自由和民主對於中國歷史變革的重要性。

1894年中日戰爭之後，清王朝面臨政治危機，革命話語在暗中醞釀，威脅著帝國的統治。據改革領袖康有為（1858-1927）自述，1898年的百日維新中，他曾上書光緒皇帝，把法國革命描述成一場血流成河的滅頂之災，他提醒說如果不馬上實行政治改革的話，清朝就會像波旁王朝那樣遭到滅頂之災。³³ 另一位著名的改革家章炳麟（1869-1936），在上海出版的改革派刊物《時務報》上提出了一個相似的警告。他寫下〈論學會有大益于黃人，亟宜保護〉一文，建議發揚傳統國學，藉以抵抗西方教會文化的入侵。異乎尋常的是，他在文章的結尾將話題轉向革命。他解釋革命這個觀念在過去只是「係一國一姓之興亡而已」，但如今「不逞之黨，假稱革命以圖乘釁者，蔓延於泰西矣。」章炳麟擔心中國人受到西方革命思潮的影響，從而變得不可控制。因此，他提倡儘快改革：「以革政挽革命」。³⁴

遠的改革運動的代言人之一。」參見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56.

³³ 參見剪伯贊編：《戊戌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冊，頁57。黃彰健認為，康有為這一奏章，據他宣稱在百日維新中曾上書給光緒皇帝，是可疑的。根據黃的研究，康有為為了推行他的憲政，在1909年和1915年寫下一份「偽奏稿」。參見黃彰健：《康有為戊戌真奏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年），頁503-505。百日維新中康有為與「革命」話語的關係，參見 Chen Jian-hua（陳建華），“World Revolution Knocking at the Heavenly Gate: Kang Youwei and His Use of Geming in 1898,”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5, no. 1 (June, 2011): 89-108.

³⁴ 章炳麟：〈論學會有大益于黃人，亟宜保護〉，《時務報》，第19冊，1897年3月，頁3b-6b。

和王韜一樣，康、章的「革命」話語也給傳統的革命內涵注入了西方革命的觀念。爲了推動改革，他們譴責革命，事實上拒絕了儒家的革命話語，結果是王韜書中記載的明治革命思想的模糊性也被丟失了。革命被消極地歸之於西方，同時它又和本土的歷史脈絡隔絕，在那裡，革命曾以人民和天命的名義來證明新朝的正義性。在質疑清政權的合法性之時，他們對“revolution”這一翻譯概念的使用不同於日本。在日本，改革和革命的觀念混合在一起，以革命的名義授權給皇室。

現代中國革命話語的另一個起源是孫逸仙。康有爲和章炳麟對革命深懷恐懼，但孫逸仙將「革命」作爲口號來使自己的叛逆合法化，並有效地喚起民眾反抗清朝的熱情。根據陳少白（1869-1934）和馮自由（1882-1958）的記載，孫在1895年宣稱他自己是「革命黨」。³⁵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孫逸仙逃往日本，見到神戶報紙稱其爲「革命黨」。孫對同行的陳少白說：「『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爲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可稱革命黨可也。」³⁶雖然一些學者對這個紀錄的真實性表示懷疑，³⁷但它確實顯示出不同語言發生交際的地點及其意義。在接受翻譯日文「革命黨」的時候，「革命」這個中文語彙被披上群眾運動和歷史進步的現代光環。具有現代媒體力量的日本新聞報導賦於中國「造反者」以權威的聲音。

發生在神戶的插曲表明，孫逸仙一開始並沒有將他的活動和「革

³⁵ 參見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頁12。

³⁶ 馮自由：《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初集，頁1-2；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98-100.

³⁷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00-103。學者對於孫中山自稱「革命黨」的疑問及具體考證參見陳建華：〈孫中山何時自稱「革命黨」？——早期思想地圖「革命」指涉的勘探〉，《第七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4年），頁13-32。

命」聯繫在一起；這同樣也可由陳少白的回憶證明，這和孫的話略似：「到了神戶，就買份日報來看看。……所以一看，就看到了『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赫然躍在眼前，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們的行為只算造反而已，自從見了這張報紙以後，就有『革命黨』三個字影像在腦中了。」³⁸ 儘管康有為和章炳麟擔心革命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阻礙，所以反對革命話語，孫逸仙和陳少白在現代意義上接受了朝代更替的意義，將「造反」轉化為「革命」，從而引起儒家革命話語的倒置。孫和陳都牢牢抓住「革命」這個新的翻譯辭彙，並將其作為社會改革的許諾。

史扶林（Harold Schiffrin）認為，孫逸仙1895年接觸日文「革命」之前，「並沒有採用過這個詞，因為它僅僅意味著統治者的名字的改變。」³⁹ 但是，孫是否能夠採用這個詞，取決於“revolution”到底是譯成「革命」或「造反」的具體條件。孫早年在教會學校接受西式教育，並從英文教科書中得知法國革命以及拿破崙和華盛頓（1732-1799）的故事。根據林百克（Paul Linebarger, 1871-1939）的孫氏傳記，1880年代孫在村民中以「天命無常」為口號開始他的排滿活動。⁴⁰ 這個口號的發明表達了他推翻天子的願望，但他絲毫未想到「革命」，因為歷史上只有那些推翻前任君主的人才能以上天的名義聲稱「革命」。當日語的「革命」新詞給孫逸仙提供了合法訴求社會變革和新的政治未來的機會時，他馬上採用了它。事實上日語的「革命」早就是一個翻譯語，抽掉了古漢語「革命」的某些內涵，並融入“revolution”的意義，已經使之轉變為一個新詞。

這一問題與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主持下的翻譯事業的背景有關。1880年代，當時最有影響的傳教士刊物《萬國公報》，積極參與改革

³⁸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102。

³⁹ Harold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99.

⁴⁰ Paul Linebarger,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York: Century Co., 1925), 200-203.

事業，定期出版文章，介紹西方的教育體系、政治和歷史，並批評傳統中國文化。⁴¹ 儘管如此，革命或造反不是傳教士所鼓勵的。偶而涉及中國和別的國家的社會或政治事件的報導時，將群眾騷動或起義譴責為「亂」，將肇事者稱為「匪」。教會的意識形態同樣表現在1882年出版的謝衛樓《萬國通鑒》中。此書對法國革命的描述比王韜《重訂法國志略》中更為黑暗、恐怖。當然，「革命」一詞在此書中未曾使用。⁴²

1896年，孫逸仙出版了英文的《倫敦被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敘述他如何在倫敦被清政府使館逮捕並囚禁的事。書中對「改革」(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的使用有趣地反映出“revolution”一詞在當時英語中的運用方式。孫爭辯說他加入的少年中國黨無意推翻滿清政權，並且它的「理念是帶來和平改革。」⁴³ 二十多年後，孫回憶在《倫敦被難記》一書中曾閃爍其詞，因為當時無法表露他排滿的思想。他說：「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⁴⁴ 但是，孫對「改革」的強調似乎並非純屬修辭策略，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revolution”在英文中確實含有暴力和叛亂的內容。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關鍵字》一書中說：「在歷史上由武裝起義或暴力衝突所引起的政治爭議中，『革命』專指暴力顛覆；到十九世紀後期此詞與“evolution”(漸進、進化)的意義相對應，意謂通過和平與憲政手段而帶來新社會秩序。」⁴⁵ 這一解

⁴¹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1898*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6, 1993), 40.

⁴² 謝衛樓：《萬國通鑒》，卷4第1部分，頁15b-16a、第2部分，頁1b-3b。見張蔭桓編：《西國富強叢書選萃》(臺北：廣文書店，1972年影印本)。

⁴³ Sun Yat-sen (孫中山), *Kidnapped in London*, 13.

⁴⁴ 孫逸仙：《中國革命史》，收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3年)，第1編第9冊，頁202。

⁴⁵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3.

釋有趣地彰顯出孫逸仙在《倫敦被難記》中使用的“revolution”一詞的含意。

該書的附錄包括一篇題為〈假定的中國革命者〉的評論，此文原先發表在香港的《德臣西報》(China Mail)上。作者明顯站在孫的一邊，說道「孫逸仙前曾在倫敦被捕，中國當局企圖將之作爲叛逆處死。他必定將成爲歷史上重要人物。」且不論文中的辯護語氣，“revolutionist”(革命者)幾乎當作“rebel”(叛逆者)的同義字來使用。比如作者說：「在中國，任何改革的提倡者或腐敗的反對者都被視爲暴力叛亂者(revolutionist)，並處以極刑。」⁴⁶ 作者還提及「流產的革命領袖」(leaders of abortive revolution)或「叛亂」(the rebellion)在「三月裡遭到挫折」。⁴⁷ 在這方面，馮自由的回憶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爲馮指出孫逸仙1894年的〈興中會宣言〉中並無「革命」一詞。但在香港的孫逸仙所熟悉的對英語“revolution”一詞的漢語譯文中，常見的卻是「造反」。⁴⁸

四、梁啟超和「革命」話語現代性

梁啟超並非使「革命」話語在現代復活的第一人，但他肯定是自覺地通過中／日／英文的翻譯而使這一話語「現代化」的第一人。他在革命話語中加入了達爾文進化論，從而賦予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理論以決定性的特徵。關於他的「革命」理論的一些文獻細節迄今爲止仍缺乏足夠的關注。對他所作的分析能夠給我對王韜和孫逸仙革命思想的討論能帶來新的觀照。

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後，梁啟超逃往日本。儘管他是個忠於清

⁴⁶ Sun Yat-sen, *Kidnapped in London*, 116.

⁴⁷ Sun Yat-sen, *Kidnapped in London*, 117.

⁴⁸ 參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9冊，頁278。

廷的改革者，但是他在1898年至1902年間主要發表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的論述卻對當時的排滿革命浪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⁴⁹ 到達日本不久，梁注意到日本人將明治時代稱為「革命時代」，將吉田松陰稱為「革命人物」。尤其使他感到興趣的是英語“revolution”被翻譯成「かくめい」，意指「社會上一切事務的變革」。為了仿效明治維新並力圖阻遏日益發展的排滿運動，梁開始在他的文章中改寫「革命」的意義。⁵⁰

1899年12月，梁啟超受康有為之命去美洲尋求華僑的支持，從橫濱乘輪船赴檀香山。在日記《汗漫錄》（後改名《夏威夷遊記》）中，他第一次宣稱「詩界革命」並展望中國的未來。他說：「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⁵¹「詩界革命」是梁啟超的自鑄之詞，在這裡「革命」即指一般意義的變革。把革命和詩歌領域聯繫在一起，意味著從受命於天的傳統政治革命話語中分離出來，由此催生出一種新的革命範式，並開啟了改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梁本人很喜歡這個新奇的詞語組合，在隨後幾天的日記中，他又提出「文界革命」，讚揚德富蘇峰（1863-1957）是現代日本傳播歐洲思想的先驅。梁說：「德富氏為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開一別生面者，餘甚愛之。中

⁴⁹ Michael Gasster,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ed. Mary Clabaugh 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67-96. 另參見 Hao Chang (張灝),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67.

⁵⁰ 梁啟超：〈釋革〉，《新民叢報》第22號，1902年12月，頁1-8。康有為也曾激動地稱讚了「革命」的新意義，在〈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一詩中，稱讚明治維新是「千年大革命」。參見康有為：〈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清議報》第9冊，1899年3月，頁577。

⁵¹ 梁啟超：《汗漫錄》，《清議報》第35冊，1900年2月，頁2257-2268。

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⁵²

梁啟超為「詩界革命」提出「三長」：「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在充分討論了這三個準則之後，他在文章最後認為詩界革命服從於更高的民族拯救的政治運動；因此他總結說，和「革命軍」相比，詩歌不過是「其小焉者也。」⁵³這一詩界革命的宣言表達了他對當代詩人的矛盾的期望：既希望他們能夠探索新的詩歌世界，成為哥倫布或瑪賽郎，但同時又希望他們能夠加入「革命軍」。新詞「詩界革命」與「革命」不無弔詭地交織在一起，仍含有政治暴力的成份。梁啟超提倡詩界革命不僅是出於美學上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要動員文學的力量去拯救中國。因為解決民族危機要求激進的政治方案，而大多數中國讀者依然習慣於「革命」的傳統意義，因此「詩界革命」或「文界革命」更容易喚醒政治革命激情，而非美學情感。

在提倡「詩界革命」之後，梁啟超在許多文章中不斷重複這一口號。他又在《新民叢報》開闢了登刊「詩界革命」批評專欄，名為《飲冰室詩話》。他的追隨者和當代詩人們響應他的號召，把他們的實驗詩作投給該雜誌。大多數詩歌糅合了西方自由、民主和革命的觀念，傳達出政治訊息。尤其在1900年義和團爆發之後，「革命」一詞在某些作品中助長了反清廷的政治運動。其中蔣智由（1865?-1929）的〈盧騷〉一詩在當時廣為傳誦。詩歌的後半部說：

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⁵⁴

然而，革命暴力滋長的趨勢卻引起梁的憂慮，他將之歸因於人們對他提倡的革命概念產生誤解，因此迫切地要去澄清它。1902年底他發表〈釋革〉一文，解釋說「革」字意指改革和革命雙重意義。“reform”指和平與漸進方式的良性變革，就如1832年英國議會變革

⁵² 梁啟超：《汗漫錄》，《清議報》第36冊，1900年2月，頁2323。

⁵³ 梁啟超：《汗漫錄》，《清議報》第35冊，1900年2月，頁2265。

⁵⁴ 蔣智由：〈盧騷〉，《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3月，頁100。

一樣。日語正確地譯之為「變革」或「革新」。“revolution”指的是「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就如1789年法國革命一樣。“reform”與“revolution”對社會進步而言都是必須的；不僅僅是政治，「人群中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都需要改革或革命。他進一步指出，日語將“revolution”譯為「革命」「非確譯也」，因為漢語「革命」出於《易經》和《書經》，「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當“revolution”之意也」。⁵⁵

梁氏的重寫「革命」在日語「かくめい」（革命）和「がいかく」（改革）之間所發生的問題寓意深長。德富蘇峰是明治維新意識形態的設計師之一，梁啟超是他主編的《國民新聞》的忠實讀者，並贊同他關於國家改革的觀點。從1882到1887年，德富在熊本創立了私立學校「大江義塾」，並編輯了校刊《大江義塾雜誌》。在雜誌中，他飽含激情地介紹自由、革命等西方觀念，事實上更傾心於英國式的漸進、溫和的革命。德富蘇峰和他的學生們在天皇憲政的庇護下提倡改革，並稱讚明治維新是「維新大革命」。花立三郎的研究表明「革命」和「改革」在這本雜誌裡交替使用，並發現兩者之間在意義上幾乎沒有區別。⁵⁶

日語中的模糊性引起梁啟超的反思，他試圖在中文裡作明確的區分。他建議用新的翻譯「變革」來代替「革命」。但我們可看到，儘管梁啟超力圖用「變革」來約束革命的「真實」意義，但正如〈釋革〉一文所示，他自己卻沉溺於「革命」的修辭之中而不能自拔：

夫淘汰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譯名言之，則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風俗

⁵⁵ 梁啟超：〈釋革〉，頁1-8。

⁵⁶ 花立三郎指出：「雖然我們現在完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兩個詞，但在當時它們沒有分別。」花立三郎：《德富蘇峰と大江義塾》（東京：ぺりかん社，1982年），頁87。

有風俗之革命，產業有產業之革命。即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若此者，豈嘗與朝廷政府有毫髮之關係而皆不得不謂之革命？聞革命兩字則駭，而不知其本義實變革而已。革命可駭，則變革其亦可駭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⁵⁷

如此陳列各種各樣的「革命」產生一種肆張而炫目的效果，反使梁啟超的「變革」說黯然失色。而他自相矛盾的解釋又引起不少爭論，使「革命」的詞義進一步擴張和衍生，且變得更具彈性。

梁啟超給「革命」的爭議進一步加入達爾文進化論和現代歷史意識。⁵⁸ 在達爾文進化論適者生存的原則下，他將改革和革命視為中國在現代歷史進程中得以生存的金科玉律。他說：「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於國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贊成大變革始。」⁵⁹ 這裡的急切訴求顯示出他的歷史必然的視界。這種對「大變革」的渴望類似於阿倫特所謂形成於現代革命時代的「對新事物的奇特情愫」。⁶⁰ 在政治上，它也表明革命理論打破了朝代迴圈變化的傳統觀念，與普世的歷史進程概念相融合。

在中國／日本／歐洲的翻譯圈中，「革命」成了一個複雜的實踐場域，革命的觀念在民族主義政治中既被普世化又被本土化。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曾論述世界文化之間的「理論旅行」（theory traveling）經歷了「四階段」：即從原點、穿梭的距離、

⁵⁷ 梁啟超：〈釋革〉，頁4。

⁵⁸ 參見 Leo Ou-fan Lee（李歐梵），“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Ideas 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Schwartz*, eds. 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9-135.

⁵⁹ 梁啟超：〈釋革〉，頁7-8。

⁶⁰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5), 21-52.

接受和抗拒的條件及達成一種適應的觀念。⁶¹ 中文的「革命」觀念經過日語かくめいの仲介，經歷了更為複雜的轉變過程，呈現某種三角關係。梁啟超後來在1904年發表一篇名為〈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文章，將這種極為複雜的情況概括為「狹義」的革命與「廣義」的革命。⁶²

梁啟超批評「狹義」的革命是因為它包含暴力。然而，在擁護「廣義」革命的時候，他卻不能完全排斥暴力的含意。1903年出版的鄒容的《革命軍》雄辯地顯示了梁啟超的宣傳如何成功地鼓動了反清民族情緒。鄒容煽動種族仇恨，聲稱中國革命必始於「誅絕滿洲種」，但他把這個革命等同於「世界之公理」，將帶來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社會變革的許諾。⁶³ 這種對現代化的承諾呼應了梁啟超的思想，即真正的革命將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變革。

正如唐小兵所觀察到的，1902年標誌著梁啟超政治思想和知識分子事業發生轉折。梁視他自己為一個「新歷史學家」和「奠定了民族主義的改寫、或創造中國歷史的理論基礎。」⁶⁴ 在這個新歷史的想像中，梁啟超試圖創造一種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話語。然而，1902年亦標誌著梁啟超的革命觀念陷入困境，他開始懷疑它在改革議程中的實效性。他認為「革命」已成爲標籤，它的新意識形態難以脫離其語言與文化的根源，且攜帶著帝國往昔的暴力的集體記憶。

不光在梁啟超那裡，「革命」一詞在現代中國歷史中傳布得愈發廣泛，仍繼續發展並累積它的意義。在西方思想和中國帝制觀念之間

⁶¹ 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226-227.

⁶² 梁啟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叢報》第46-48號（1904年2月），頁115-131。

⁶³ 鄒容：《鄒容文集》（重慶：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1。

⁶⁴ Xiaobing Tang (唐小兵),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相交涉的過程中，「革命」的新意不再與其固有的語源相同，而與之伴隨著全球和普世的資訊。在追溯「革命」一詞瀰漫於現代中國的歷史之時，我回憶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而不由想到「革命」一詞在今天中國大陸政治話語中似已消聲匿跡。但是對我而言，「革命」繼續控制著社會，在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中以不同的方式——或以否定的方式——發揮其影響力。當下的一個趨勢是要否定或逃離「革命」，李澤厚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就是這一趨勢的最佳例證。⁶⁵ 但我們已經看到，此類否定從梁啟超的翻譯開始一直都是中國複雜的革命經歷的一部分。因此，「革命」的使用或「誤用」，都是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性及其全球意義的關鍵。

（責任編輯：周謝宏）

⁶⁵ 李澤厚：〈和平進化，復興中華——談「要改良，不要革命」〉，《中國時報週刊》（China Times Weekly），1992年5月3日，頁42-45、1992年5月10日，頁44-47；吳國光：〈革命和改革〉，《民主中國》第4期（1990年10月），頁57-68。另一種革命和改革兩分法的變化是革命和現代化。參見 Chang P'eng-yuan（張朋園），“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1860-1949,”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 (June, 1999): 47.

徵引書目

- 小島佑馬：《中國の革命思想》，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
-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 王 韜：《重訂法國志略》，上海：淞滬廬刊本，1890年。
- 王 韜：《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竹內好、野村浩一編：《中國 I：革命と傳統》，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
- 吳國光：〈革命和改革〉，《民主中國》第4期，1990年10月，頁57-68。
- 李澤厚：〈和平進化，復興中華——談「要改良，不要革命」〉，《中國時報週刊》，1992年5月3日，頁42-45、1992年5月10日，頁44-47。
- 奈良本辰也、眞田幸隆編：《吉田松陰》，東京：角川書店，1976年。
- 岡本監輔：《萬國史記》，華國堂藏本，1900年。
- 所 功：《三善清行》，東京：吉川弘文館，1970年。
- 花立三郎：《德富蘇峰と大江義塾》，東京：べりかん社，1982年。
- 孫逸仙：《中國革命史》，收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9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3年。
- 秦力山著，彭國興、劉晴波編：《秦力山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康有爲：〈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清議報》，第9冊，1899年3月，頁577。
- 張朋園：〈革命與現代化交織下的近代中國〉，《思與言》第29期，1991年9月，頁2-19。

- 梁啟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叢報》第46-48號，1904年2月，頁115-131。
- 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新民叢報》第17號，1902年10月，頁1-7。
- 梁啟超：〈釋革〉，《新民叢報》第22號，1902年12月，頁1-8。
- 梁啟超：《汗漫錄》，《清議報》，第35、36冊，1900年2月，頁2265、2323。
- 章炳麟：〈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時務報》，第19冊，1897年3月，頁3b-6b。
- 野口武彥：《王道と革命の間》，東京：筑摩書房，1986年。
-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
- 陳建華：〈孫中山何時自稱「革命黨」？——早期思想地圖「革命」指涉的勘探〉，收於《第七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4年，頁13-32。
- 陳建華：〈晚清「詩界革命」發生時間及其倡者考辯〉，《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321-340。
- 陳建華：〈晚清「詩界革命」與批評的文化焦慮——梁啟超、胡適與「革命」的兩種意義〉，收於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 edited by John C. Y. Wang (王靖宇).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朱宏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 馮自由：《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黃彰健：《康有為戊戌真奏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年。
- 溝口雄三：〈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色〉，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年，頁343-361。

鄒容：《鄒容文集》，重慶：人民出版社，1983年。

翦伯贊編著：《戊戌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蔣智由：〈盧騷〉，《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3月，頁100。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年。

樹立山人：〈尊革命〉，《清議報》，第94冊，1901年10月，頁16a-17a。

謝衛樓：《萬國通鑒》，張蔭桓編：《西國富強叢書選萃》影印本，臺北：廣文書店，1972年。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65.

Brinton, Crane.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ng, Hao (張灝).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en, Jian-hua (陳建華). "World Revolution Knocking at the Heavenly Gate: Kang Youwei and His Use of Geming in 1898." i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5, no. 1 (June, 2011).

Cohen, Paul.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Fairbank, John King.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Cornelia & Michael Bessie Book, 1987.

Franke, Wolfgang.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70.

Lee, Leo Ou-fan (李歐梵). "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Ideas 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Schwartz*, edited by Paul Cohen and

- Merle Gold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Liu, Lydia H (劉禾) .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asini, Federic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1898*.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6, 1993.
- Said, Edward W.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 Sansom, G. B.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2.
- Schiffrin, Harold Z.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Schwartz, Benjamin,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Sun Yat-sen (孫中山) . *Kidnapped in London*. London: Bristol, 1897.
- Tang, Xiaobing (唐小兵) .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Tsunoda, Ryusaku (角田柳作) ,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ed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Wright, Mary Clabaugh,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